1

基本完成

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初步建立起来了

然而 作为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的中国

其生产力发展水平

以及科学文化等方面都十分落后

如何在新的制度下全面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面临的全新的课题和全新的任务

国际方面

当时世界不同阵营出现了缓和趋向

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这些都为刚刚起步的中国经济建设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也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件

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二十大上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揭露了斯大林

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错误

包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

剧烈震动和尖锐分歧

苏共二十大以后

西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

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

同年6月和10月

波兰 匈牙利先后爆发大规模的工人罢工

和群众暴力冲突

一些敌对势力乘机插手

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在国内

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

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不少人对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还不能马上适应

一些人甚至持怀疑态度

加上党和政府工作部门存在的某些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现象

以及少数干部滋生的特权思想和作风

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

并导致1956年下半年

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

学生罢课 农民退社等情况

国际 国内出现的这些新情况

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认为

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

但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则必须坚持

苏共领导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

有助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但从基本原理上说来

十月革命道路

“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

一个特定阶段内

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

简单抛弃

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下的

苏联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历史

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不利于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原理

和团结教育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

继续前进

正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

是要独立思考

应该从各个方面考虑

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

努力探索并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在1956年4月4日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

“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

调查研究 摸清本国国情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制定我们的路线 方针 政策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

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

但也不是没有缺点

没有片面性

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

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

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

开始我们模仿苏联

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 只好如此

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

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

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强调开动脑筋 强调创造性

在结合上下功夫

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

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

毛泽东提出的

关于实行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

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的看法

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1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

要在几十年内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

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

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中共中央还把拟定的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

并向全国人民公布 毛泽东后来还指出

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

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

这样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

必须有自己的教授 教员 科学家

新闻记者 文学家 艺术家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 人少了是不成的 ”

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

“向现代科学进军”

周恩来在会上指出

“在社会主义时代

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

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 ”

会后 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

集中数百名科学家 经过反复研究

于同年10月制定了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这个规划的实施

填补了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

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

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

2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 刘少奇等领导人

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

从1956年2月到4月

毛泽东等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工业 农业

运输业 商业 财政 计划

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一次

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

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

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的一开始就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

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 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

少走了一些弯路 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

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

概括阐明了十大关系

即重工业和轻工业 农业的关系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家 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是与非的关系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 围绕一个基本方针

即 “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

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

直接的 间接的积极因素 全部调动起来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后作总结讲话

进一步提出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确立

适应了国家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

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

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成为党和国家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科学进步的指导方针

后来也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

《论十大关系》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它对于中共八大路线的确立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党的

八大政治报告的刘少奇明确地讲过

起草党的八大报告

要以《论十大关系》为纲

毛泽东后来也回顾说

“前八年照搬外国的经验

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

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致开幕词

刘少奇作政治报告

周恩来作关于

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八大文献的起草

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

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

经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

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

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指出 社会主义制度

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

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最后消灭剥削制度

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

但是国内主要矛盾

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

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

发展社会生产力

实现国家工业化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

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但其根本任务

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曾说

“(报告)重点是两个

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

一个是经济建设 这两个重点中

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

他还指出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

达到什么目的 总的说来

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

团结全党 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

可以说 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这就是八大的路线 八大的方针 八大的主题

在经济建设上 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政治建设上 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

“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在执政党建设上

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

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

反对个人崇拜

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在大会发言中 陈云提出

“三个主体 三个补充”的思想

即 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

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

计划生产是主体

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

国家市场是主体

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 并写入决议

成为突破传统观念

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为副主席

邓小平为总书记

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实践证明

中共八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

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它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针对前述1956年下半年之后出现的

国际国内新情况

各级领导干部缺乏思想准备

或者束手无策

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

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1957年2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这篇讲话后经修改和补充

在同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重点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

毛泽东指出 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

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的矛盾

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但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不是对抗性的矛盾

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不断地得到解决”

第二 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指出 在我国社会中

“有两类社会矛盾

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 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

是非对抗性的 在区分两类社会矛盾的基础上

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

应当运用的方法

他强调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

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只能用民主的 说服的 教育的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第三 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提出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

这一点必须肯定

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

他说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

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没有农业 就没有轻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

重工业有了市场 有了资金 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一篇十分重要的理论著作

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

首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这篇文献

连同八大确立的路线和毛泽东此前发表的

《论十大关系》

是中国共产党人

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然而 由于历史的局限

中国共产党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认识还不够成熟

八大的正确方针在党内未能牢固确立

一些重要思想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

在新的社会变革时期

党内许多人对此缺乏应有的认识

不了解或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

不会处理新时期的新矛盾 针对这种情况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做下发了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

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处于执政地位

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

检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

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情况

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

检查不从六亿人民出发

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

检查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

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全面加强党的思想

组织 作风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创造

在执政的条件下

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等错误倾向 更需要采取整风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

这次整风应当是一次

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

是一次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运动

通过发动群众向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意见

帮助党纠正官僚主义等问题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

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

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

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 监督

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

毛泽东曾经肯定开门整风取得的成果

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他在1957年7月撰写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

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通称“六又”政治局面）

进行整风和提出建设

“六又”政治局面等思想

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各种意见

绝大多数是诚恳的

但5月中下旬之后

首都等地的主要高校学生开始加入整风鸣放

出现大字报 大辩论的大鸣大放高潮

上述各种座谈会 鸣放会上的发言也趋于激烈

出现了一些数量虽少但极富煽动性的错误言论

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

有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成就

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居多”

散布今不如昔 有人不满社会主义制度

提出“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有的公然要求共产党员退出机关 学校

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

还有人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应通过竞选轮流执政 等等

这些言论一度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

特别是个别民主党派负责人

和著名知识分子发表的若干争议言论

更加剧了混乱和紧张气氛 例如

有人认为我国基本制度有“重大缺陷”

提出应该另行成立“政治设计院”

有人要求检查“三反五反”和肃反的“偏差”

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

有人把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称为“党天下”

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还有的人散布当时的形势

已经天下大乱 共产党混不下去 该下台了

上述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关注

5月15日 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他指出

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

不顾一切

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

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

党外知识分子中 右派约占1％到10％

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

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响应

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标志着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

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全国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

其中绝大多数是错划

运动中采取的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斗争方式

也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首先 它直接地打击了我国各条战线

各个领域内一大批治国兴邦的优秀骨干分子

许多领导干部 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工商界人士 特别是教育

科技和文化等各界专家 学者和艺术家

及部分青年知识分子 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遭受歧视和打击

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中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这不仅是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损失

也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损失

其次 它导致了“左”倾思潮的急剧发展

造成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紧张

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受到了严重挫折

这场粗暴和过火的斗争 堵塞了言路

实际上打断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

最后 这场严重扩大化的斗争

还导致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时期

阶级斗争理论上的严重失误

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开始改变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认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

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

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

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

给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造成了严重后果

3

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

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

“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

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

在胜利面前

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

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

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忽视经济规律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

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从1957年9月至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

毛泽东开始持续重批1956年的“反冒进”

1957年10月9日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

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

扫掉了农业40条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是“右倾” 是“促退”

给群众泼了凉水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原则通过了带有多项冒进指标的

《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

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随后 经毛泽东过问和审阅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

公开批评反冒进是

“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

像蜗牛一样爬行”

反冒进是“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

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号召人们批判右倾保守

“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957年11月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

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

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代表会议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在莫斯科的庆祝大会上宣布

通过和平竞赛 苏联要在今后15年内

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受此影响

毛泽东在随后的会议发言中也提出

中国要在15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的目标

中共中央公布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和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要求

立即成为全国人民加快工农业建设的奋斗目标

全国各地和中央各业务部门

立即据此修改原定的发展计划

提出和拟定了一些力图

实现“大跃进”的高指标

有些地区还提出了

“苦干三年 基本改变面貌”

和大幅度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等口号

特别是在农村

1957年冬季掀起了以兴修农田水利

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

全国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动力

1957年10月是两三千万人

11月猛增到六七千万人

12月约8千万人

1958年1月约达1亿人

这实际上成为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和3月

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

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认的

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严厉批判反冒进

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

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

这些做法实际上破坏了

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

偏离了实事求是 稳步前进的正确轨道

1958年5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其正确的一面

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

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

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

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

本来是相互制约的

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

突出了一个“快”字

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在这之后制定的

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

第二本账的主要指标过高

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

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

在大跃进中 高指标 瞎指挥 虚报风

浮夸风 “共产风”盛行

各地纷纷提出

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

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

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在农业上

提出“以粮为纲” 不断宣传“高产卫星”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

在工业上 提出“以钢为纲”

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

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

“大炼钢铁” “土洋结合” “大中小结合”

小高炉遍地开花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土小高炉

7月份约3万座 8月增至17万座

9月份达60万座 10月底高达几百万座

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 8月底几百万人

9月底5000多万人 10月底6000多万人

年底9000多万人 至1958年年底

宣布钢产量为1108万吨

生铁产量为1360万吨

经核实好钢仅有800万吨

合格生铁只有953万吨

据国家统计局估算

1958年土法炼钢炼铁的亏损

至少达到50亿元

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

在“大跃进”的同时

还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

公有化程度越高

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错误思想指导下

1958年7月 8月

毛泽东在视察期间

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

1958年8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

通过了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

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9月初 《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

在全国范围掀起了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

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

所谓“大” 就是规模大

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

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

所谓“公” 就是公有化程度高

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

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

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

它严重地脱离了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

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

所谓“平” 是指

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

平均分配

“调”是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

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

这就损害了广大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

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

1958年11月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

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

废除商业 消灭商品生产之势

发展下去势必会重犯

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

这次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

“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

1l 12月间

毛泽东在武昌

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和八届六中全会 着重纠正急于

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

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的倾向

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1959年2月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

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

和过分集中的问题

提出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 三级核算

各计盈亏 按劳分配 承认差别的方针

同年3 4月间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

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并开始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

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

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同时 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

恢复社员饲养家畜家禽

鼓励社员充分利用闲散土地

种植庄稼和树木

经过这些努力

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

和过分集中的体制有所改变

“共产风”得到抑制

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将1959年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

其他各项指标也作了大幅度降低

并基本纠正了“浮夸风”

初步解决了“瞎指挥”的问题

这一系列纠“左”行动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但是

上述这些初步纠“左”的错误的努力

是在继续坚持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

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59年7月2至8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江西庐山举行

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

要求与会者讨论

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

巩固纠“左”成果

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

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

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还7月14目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

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

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

犯错误的主观原因

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

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7月23日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

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

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

“三面红旗”

（即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的

猖狂进攻

8月2日至16日

毛泽东在庐山主持

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作出了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

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庐山会议和其后的反右倾斗争

中断了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

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在“反右倾鼓干劲

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

又错误地搞起了新的“大跃进”

高指标 瞎指挥 浮夸风 “共产风”

重新泛滥起来

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的比例失调

工农业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

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

国家财政出现巨大赤字 通货膨胀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

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撤走全部专家

中国国民经济

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

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粮 油和蔬菜 副食品的极度缺乏

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

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

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

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

死亡率显著增高 据正式统计

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

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

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

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

给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调整政策 纠正错误

毛泽东在1960年6月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

和同年1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

都讲到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

同年11月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十二条”)

指示信最重要的是规定了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

开始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

农业和农村问题

1961年1月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的八字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随后 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

分赴浙江 湖南 广东

到农村基层做调查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邓小平等

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同年3月

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

毛泽东主持制定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农业六十条”) 后几经修正

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废除供给制 停办公共食堂

“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

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

在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

邓小平等的主持下

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

商业 教育 科学 文艺

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

总结历史经验 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推动国民经济

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

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 中央局

省 地 县五级领导干部

共7118人 史称“七千人大会”

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

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

会上 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

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

畅所欲言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

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

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

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

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62年到1965年

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八字方针

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

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

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1964年底到1965年初

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并宣布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

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

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 “单干风”

“翻案风”的批判

对党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消极影响

这些错误批判

是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

左倾错误理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

毛泽东在会上

把社会主义社会中

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间

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最初称为“四清”运动）

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

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起了一定作用

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

都认为是阶级斗争

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在1964年下半年

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

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

也对一些文艺作品

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

进行了错误的 过火的政治批判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

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不过

这些错误当时

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4

是全局性的 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它使中国共产党 国家和人民遭到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

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

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

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

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

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

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 他曾为此作过多次尝试

然而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指导思想的支配下

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

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

作出了严重的错误估计

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

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

公开地 全面地 自下而上地

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

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已经混进党里 政府里 军队里

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

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

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各省 市 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上述论点曾被概括成为 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

及其实践 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

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并被他所重用过的林彪

江青 康生等人所利用

1965年11月10日 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

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的这篇文章

毫无根据地把明史专家吴晗所编

《海瑞罢官》一剧中所描述的

明朝历史上 海瑞所进行的

“退田” “平冤狱”等情节

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

“单干风” “翻案风”联系起来

说“‘退田’ ‘平冤狱’

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猛烈攻击《海瑞罢官》

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是一株毒草”

这篇大批判文章成为毛泽东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

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述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会议还决定

设立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以陈伯达为组长 康生为顾问

实权则掌握在副组长 毛泽东之妻江青手中

随后 由毛泽东批示

在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

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对于鼓动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

“踢开党委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

1966年8月1日至12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并在全会上印发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

全会通过的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简称“十六条”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1967年1月 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

在张春桥 姚文元的策划下

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

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

号称“一月革命”

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在夺权过程中

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

加上江青 陈伯达 康生 张春桥等人趁机煽动

在全国掀起了

“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的狂潮

他们把批判的矛头 集中指向

刘少奇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实际上 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

以刘少奇 邓小平为首的

“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运动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

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

及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在运动中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

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

并陷于瘫痪 半瘫痪状态

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

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这些情况 不可避免地给一些

投机分子 野心家 阴谋家以可乘之机

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

重要的 以至于非常重要的领导岗位

同年2月中旬

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

参加的不同会议上

谭震林 陈毅 叶剑英 李富春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等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

提出强烈的批评

然而 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

“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估计

“全面夺权”在1967年2 3 4月

就要看出眉目来

然而 同年6月到8月

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北京和外地的

上千个造反派组织

成立“揪刘火线”

聚集上万人围困中南海

7月22日 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8月7日 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

“砸烂公 检 法”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

此后 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

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

为了稳定局势

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

如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

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等

经过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

历时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

各省 市 自治区 除台湾省外

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

全会批准通过所谓《关于叛徒

内奸 工贼 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经过认真复查 确凿的事实证明

这份《审查报告》

是在江青 康生 谢富治的把持下

采用“逼供信”等种种非法手段

制造大量伪证拼凑出来的

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

完全是不实的诬陷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是在“左”倾思潮泛滥

党内外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

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全会

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是完全错误的

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10月 重病中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

11月12日 刘少奇

这位二届全国人大和三届全国人大

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含冤病逝于开封囚禁处

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

多达2.6万余件 涉及2.8万多人

刘少奇冤案的酿成

是党的历史上

继30年代苏区肃反扩大化之后

最为沉痛的教训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对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攻击 批判

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赞扬

都是完全错误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召开

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

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加强了林彪 江青两个集团

在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地位

九大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

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曾多次预计

“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 两三年内

有一个好的结束

但局势的发展 即使对他来说 也难以驾驭

多次的预计流于落空

九大的召开 并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

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

恰恰相反

由于思想上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

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

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中共九大闭幕后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

全国开展了“斗 批 改”运动

“文化大革命”即进入了

“巩固胜利成果”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

一方面是通过全面的“斗 批 改”

落实政策 加强团结

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

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另一方面

按照“抓革命 促生产”的基本方针

发展生产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 “天下大乱”造成的破坏创巨痛深

造成的矛盾 堆积如山

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

局势是不可能稳定的

“斗 批 改”运动

在许多方面继续制造着混乱

但同“天下大乱”时的情况相比

社会秩序还是逐步有所好转

1970年3月 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

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

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机会

认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

并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

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

把原定的全会议程搁置一边 抢先表态

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

伟大领袖 国家元首 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

坚持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

随后 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

陈伯达和林彪集团其他成员

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

企图左右全会的进程

毛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

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 对陈伯达实行审查

1971年4月 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林彪集团决心铤而走险

他们一面敷衍检讨 一面策划武装政变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

毛泽东到南方一些省视察

一路上 他分别同湖北 河南 湖南

广东 广西 江苏 福建等地的

党 政 军负责人 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

对林彪提出尖锐的批评

林彪等人获悉后大为恐慌

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

于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史称“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

领导全党进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分裂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

是“文化大革命”推翻

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

它一方面引起广大党员 干部 群众

对林彪反革命集团

分裂党和国家罪行的痛恨

他们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 周恩来

粉碎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决策

在另一方面 在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

人们清楚地看到

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

竟然阴谋杀害他所高呼的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这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

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

希望以此为契机纠正一些

明显的“左”倾错误

多少落实一些党的有关政策

调整和改善一下党内外的各种关系

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

“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它的尖锐性和突发性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毛泽东一方面支持周恩来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逐步落实干部政策

并进行整顿

提出批判极“左”思潮

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

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毛泽东也承认自己用错了人 听信了谗言

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了责任

但另一方面 毛泽东又不允许

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

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

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共十大后

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开始的

“批林批孔” 运动中

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时间 派性斗争又起

极“左”思潮再度猖獗

江青等人还利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之机

准备实现“组阁”的图谋

1974年7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

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并当众宣布

“她并不代表我 她只代表她自己”

随后 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最终遭到挫败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

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

会后 周恩来病重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

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面对“文化大革命”八年来累积的成堆问题

1975年 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

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毛泽东最初是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的

5月27日和6月3日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意见

王洪文 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然而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

逐渐涉及“文化大革命”

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

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

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

“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

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

全国又陷入混乱

1976年1月8日

周恩来总理逝世 举国悲痛

清明节前后

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

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

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当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

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毛泽东提议华国锋

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

同年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

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0月6日晚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斗争中 华国锋 叶剑英 李先念等

起了重要作用 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公布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举国欢腾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对于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

是一场灾难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

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

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

并运用符合宪法 法律和党章的

正确措施加以解决

但决不应该采取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既没有经济基础 也没有政治基础

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

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 破坏和倒退”

历史已经判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给党 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它使国民经济在动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

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

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

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

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

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历史悲剧

决不允许重演

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

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帮助

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

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

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政治上具有自我净化 自我发展的能力

5

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

所以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中国实际全面地 正确地结合起来

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不能不经历一个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过程

1957年下半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

本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

发生的严重错误

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归根结底

并不是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

而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完全可以纠正这些错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

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

还多次要求全党

认真学习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的著作

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

是马克思主义的

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

主观动因和错误性质

邓小平曾有两段重要论述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之所以会犯像“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

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

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

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

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

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

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因此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二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

出现的新矛盾 新问题时

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

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

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

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大规模

急风暴雨式 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

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同时 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

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由于把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中的

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

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

这就造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

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

当做社会主义本质来坚持

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误

当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

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

当做两条路线的斗争

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

第三 在探索中出现的一些失误

本来是应当通过发扬民主

总结经验教训 去及时发现并加以克服的

但是 在中国共产党面临

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

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

毛泽东却逐渐骄傲起来

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

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

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

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

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

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封建主义

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

进行了最坚决 最彻底的斗争

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

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

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

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肃清的

种种历史原因又使得中国共产党

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

加以制度化 法律化

或者虽然制定了制度 法律

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

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

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

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这样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

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

需要做具体的 历史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

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

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做是

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

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

就是在“大跃进”造成

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

党和政府依然具有团结人民共渡难关的

巨大凝聚力

依然具有认真总结教训 妥善解决问题

把事业推向前进的能力

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 共渡难关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

而且还能维持统一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

国家仍然保持统一

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这些重要事实

既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也是广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

共同努力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保护过一些党 政 军领导干部

和党外著名人士

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

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对江青 张春桥等人

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

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的图谋得逞

在对外关系上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

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

周恩来忍辱负重 苦撑危局

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全力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的运转

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

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

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

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

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

发现错误 抵制错误 纠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

和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是艰难曲折的 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 政府

和广大工人 农民 解放军指战员

知识分子 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

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

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

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的成员

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

党的干部 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

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

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

对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

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

劳动模范 爱国民主人士 爱国华侨

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

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

和拥护共产党 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在“文化大革命”中

尽管遭到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

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干部群众

终于战胜了他们

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

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正如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所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的历史 总的说来

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忽视错误 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

这本身就是错误

而且将招致更多 更大的错误

但是 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

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

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

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

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6

尽管经历过严重的曲折

从总体上说 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

从“一五”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

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打基础的重要发展时期

尽管经历了“大跃进”

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

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

从1952年到1978年

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

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

其中工业年均增长达到11．4％

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排名

明显提前

在这期间 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按照不变价格计算

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

1976年增加到2 943．7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

这个数字虽然还很低

但在原有基础上的增长仍是很明显的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

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

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

为中国以后的发展

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

而且也为中国同

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

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创建了前提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

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

主要工业产品全部依赖进口

从“一五”计划开始

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

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

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

涉及冶金 汽车 机械 煤炭 石油

电力 通讯 化学 国防等领域

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

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

累计达4 956．43亿元

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有了飞跃的发展

钢产量 发电量 汽车产量 原油

原煤产量均大幅提高

铁路 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同样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

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从1964年“三五”时期开始

到1980年“五五”时期结束

共投资2 052亿元

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

而且对改善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

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给国内的和平建设

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

人民解放军出色地完成了

东南沿海地区对敌斗争

平息西藏武装叛乱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等重大作战任务

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安全

7

始终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

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

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通过兴修水利 开展农田基本建设

培育推广良种 提倡科学种田

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

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粮食 棉花的总产量 亩产量均有大幅提高

全国总人口 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

全国农民的人均消费水平

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

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

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

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

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

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

就是扫除文盲 大力推广普通话

并加大对小学 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入

从1949年到1976年 大 中 小学校的数量

与在校生人数均有很大的发展

文学艺术工作尽管不断受到“左”的干扰

但在“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引下

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戏剧 电影

音乐 舞蹈 小说 散文和诗歌等

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 郭沫若 茅盾

范文澜 翦伯赞 巴金 老舍 曹禺 赵树理

徐悲鸿 齐白石 梅兰芳等

一批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

为繁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

和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

全国医院总数 床位总数

人均预期寿命均有大幅增长

死亡率大幅下降

新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

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

从1956年到1976年

中国运动员先后有123人次打破世界纪录

新中国在核技术

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

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

1964年10月

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 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970年1月 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

同年4月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5年 可回收人造卫星试验成功

这些成就表明

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

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

其中 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

提前实现

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

新中国还在1949年11月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

一些重要的现代科学分支和新兴应用技术

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起来 华罗庚 李四光

茅以升 竺可桢 童第周

钱三强 钱学森 邓稼先

郭永怀 袁隆平 陈景润等

一批科学家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同举国上下艰苦奋斗

和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涌现出像大庆

和大寨那样艰苦创业的英雄集体

涌现出的大量英雄模范人物

如雷锋 王进喜 焦裕禄等

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和精神风貌

8

就把坚持独立自主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

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

美国等国不但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

而且实行封锁 遏制政策 阻挠中国统一

并让台湾当局长期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

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

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 援助

一面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

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以民促官 以经促政

并在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

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同印度 缅甸等国

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更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

同中国接壤或临近的亚洲国家

绝大多数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

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

中国先后同缅甸 尼泊尔 蒙古

巴基斯坦 阿富汗等国

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

中国长期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

先是支持越南人民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

随后又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

20 世纪 50 年代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

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这些国家积极争取恢复新中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并在 1971 年 10 月获得成功

从此 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

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20世纪60年代末 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

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

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

毛泽东 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

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了“乒乓外交”

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1972年2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同年9月 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

随着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

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同英国 荷兰 希腊 联邦德国等国

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

中苏关系也趋于缓和

这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

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中国建交的国家

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

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就有62个

9

在创建新中国和探索

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

逐步形成或进一步完善了

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在此基础上

毛泽东等领导人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

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

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造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原则

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

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

增添了新的财富

这些思想成果

为党继续进行探索

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

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

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

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探索

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

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

10

我们都知道中共八大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

如果按照八大的路线走下去呢

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会

偏离八大的既定路线

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呢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

应该说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

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使中国真正的发展 强大起来

“赶超”英美资本主义国家

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实毛泽东的“赶超”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1953年制定一五计划

毛泽东之所以全面接受了苏联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就是因为看重苏联的模式发展速度比较快

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超越资本主义的国家

1955年10月

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用50年-75年的时间赶上美国

56年9月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提出

如果我们在五六十年内赶不上美国

我们就会被开除球籍

之所以会在1957年-1958年突然提速

毛主席突然提速

与当时的国内国际的情况都有关系

在国内 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实现

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增强了毛泽东的信心

在国际上

随着苏联建设中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

随着中国 毛泽东本人

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的地位日益提高

毛泽东越来越不满于模仿苏联的模式和经验

你知道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

赫鲁晓夫说苏联要用十五年时间赶超美国

毛泽东紧接着在会上就说

我们中国要用十五年的时间

“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这多多少少是有一点与苏联

与赫鲁晓夫争锋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我认为 大跃进啊

他在明面上的口号你知道是“超英赶美”

但是台下还有一个潜台词 就是“赛苏”

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竞赛

毛泽东想要探索出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苏联更快更好的发展道路

所以从莫斯科回来以后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毛泽东

这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性情也比较急噪起来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

难道就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

还要困难吗 我不相信”

所以你看毛泽东已经准备开始

用打战的模式来搞建设了

头脑已经开始发热了

那毛泽东一个人头脑发热

为什么整个中共中央高层

也跟着头脑发热呢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建国之初 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

毛泽东主席的威望越来越高

他听到的赞扬的话也越来越多

应该说毛泽东主席也逐渐的骄傲起来

进而开始逐渐的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

毛泽东持续地批评周恩来 陈云

1956年主持的“反冒进”

毛泽东认为他们为

57年的右派进攻提供了炮弹

是政治性的错误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说他们反冒进“离开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

以致于周恩来都向中共中央提出

要慎重的考虑

我还适不适合继续当总理的问题

在批评反冒进的同时

毛泽东又提出对个人崇拜要分析对待

有些人批评个人崇拜是为了让人崇拜自己

毛泽东说个人崇拜

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和错误的个人崇拜

一个人能不崇拜真理么

一个班能不崇拜班长么

这个表达就很有意思了

我们党内啊 又时不时存在那些跟风 帮倒忙的人

比如华东局的第一书记柯庆施

他就在成都会议上向毛主席献媚

他说啊

“我们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

我们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 ”

这就在党内形成了一种盲从毛主席

迷信毛主席的氛围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经济建设真的能搞得快一点

谁会不欢迎呢 所以头脑发热这个现象

不仅毛泽东有

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或多或少也是有的

就是在当时的普通的党员干部中

也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苗头

这种情绪 这应该说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

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心情

而萌发出来的一种历史现象

你知道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总结的

“我们都是搞革命的

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

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

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

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

在大跃进运动之初

基层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也表现出极为高昂的热情

是 经过50年代前期的土地改革

应该说中国人民 特别是农民的生活

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55年合作化高潮之后

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集体走

你知道57年秋之后我们又开始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这就造成了一种

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

是可行的是有效的这么一种假象

我们看看当时在民间流传的民谣啊

不靠老天靠自家 兴修水利战胜它

就是老天不下雨 也叫禾苗出嫩芽

这个可能吗

山硬硬不过决心 山高高不过脚心

清早上地满天星 晚间归来鸡叫声

这就是不睡觉了嘛 还有

抓晴天 抢阴天 小风小雪是好天

汽灯底下是白天 争取一天当两天

这些民谣反映出来的是

已经是一种比较明显的

脱离客观实际的一种倾向了

是啊 亿万人民群众头脑都热起来了

那显然是会失控的 您觉得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大的教训就是

在实际工作中背离了

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

便从主观的愿望出发

无限地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

目标 方针 政策

造成了实际工作中

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状况

这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

由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如今在一些人当中

又出现了一股怀念文革的思潮 您怎么看

改革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

应该用深化改革的方式来解决

而绝不能走封闭和僵化的老路

怀念文革甚至赞美文革的思潮

我认为更是完全错误的

是因为这些人对文革的历史

特别是文革的危害缺乏了解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二卷所指出的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

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

在政治 思想 文化 经济

党的建设等方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政治上

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

受到了空前的浩劫和损失

党和国家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 受到迫害

据对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

所列举的受诬陷名单统计

“文化大革命”中

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

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 民主党派的负责人

各界的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

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

“文化大革命”中

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一共有230万人

占了“文化大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

虽然没有被立案“审查”

但是被错误的批斗关押的干部

和受株连的人数就更多了

其中 中央 国家机关副部长

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

被立案“审查”的这个比例啊

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

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

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

涉及的干部达几十万人

因为大量的冤假错案受到诬陷

迫害株连的更是难以计数了

党和政府的各级的机构

长期陷于瘫痪或者不正常的状态

你知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达九年之久

全国政协 十年内根本就没有开会

所以这个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思想上

“文化大革命”他所依据的这个理论啊

既不符合实际 也在许多方面违反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许多错误的

甚至荒谬的理论宣传泛滥成灾

造成了人们思想的这种空前的混乱

像“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混淆是非

混淆敌我 无限上纲 乱批乱斗

甚至侮辱人格的现象非常多

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讲的思想教育工作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经过十年内乱

我们的党风被破坏了

社会风气明显不如以前了

道德水准下降了 极左思潮 无政府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 个人迷信

以及各种错误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

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在文化上

“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

和民族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破坏

使文化事业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十年历史的实践证明

这场“大革命”绝不是马克思所讲的

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

而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

“文化大革命”以“左”倾错误思想

对科学文化事业进行所谓的“批判”和“大破”

使之受到严重摧残

新闻事业也受到严重的挫折

新中国建立后前17年拍摄的

650多部的故事片被打成所谓“毒草”

禁止发行上映 教育思想被严重的扭曲

无数优秀的祖国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

非常的可惜 有很大一部分教育 科学 文化

等领域的知识分子被打成所谓的“牛鬼蛇神”

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

民族传统文化和各种文化遗产

遭到了惨重的破坏

很多有造诣的专家 学者受到人身侮辱

被关进“牛棚”甚至下放“改造”

一段时间里 学校关闭 学生停课

文化园地都荒芜了

科研机构被大量的撤销

在这十年间

我们高等教育和中专学校

少培养了几百万专业人才

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出现了长期的空白

科技水平同

同时期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

我们中国的文盲和半文盲有2.3亿多人

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近1/4

这种状况当然是严重影响了

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在经济上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

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

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

从吃的方面看 粮食人均消费量

1976年是380.56斤

比1966年的379.14斤就多了1.42斤

10年人均粮食才多了1.42斤

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

1976年为3.19斤 低于1966年的3.52斤

比文革爆发前还低

从穿的方面看 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

1976年是23.55尺

比1966年的19.89尺略高了一些

但是比以前最高的的时期

最高点的1959年由29.17尺还是要少了5.62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正是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持续发展的时期

我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抓住了这个机遇

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或者地区

而我们中国在这个宝贵的时期却处于内乱之中

丧失了非常好的历史机遇

所以邓小平同志说

“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

但是不太大

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

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 ”

“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

生活水平很低 生产力没有多大的发展”

这是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在党的建设上 你知道

“文化大革命”他自我标榜是什么呀

他宣传 他被宣传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

“最广泛 最深刻的整党运动”

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党组织的建设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所以“文化大革命”

没有给党的建设带来任何的积极影响

它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

严重的破坏了民主集中制

破坏了党的作风

败坏了党的纪律 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

实践证明 “文化大革命”

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

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

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

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二卷下册

对“文革内乱的严重危害”

有更为具体的阐述 大家应该找来读一读

谢谢老师 那您觉得我们应该

从文革这段曲折的历史吸取的教训有哪些呢

要重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建设

邓小平说过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 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 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 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 而这种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从更长远更宏观的意义上说

那就是要依法治国

正如邓小平1980年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提出的

“如何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所说的

“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

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

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

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问题”

确实是这样

法治建设是一个长久的历史性过程

刚刚过去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了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就是深刻总结了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

和深刻教训所作出的重大的抉择

好的 谢谢翁老师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